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Businessmen of Ningbo Origin

寧波幫大辭典

主編

金普森

孫善根

寧波出版社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Businessmen of Ningbo Origin

寧波幫大辭典

主編

金普森

孫善根

寧波出版社

F729-61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帮大辞典/金普森等主编.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0. 12

ISBN 7-80602-389-5

I. 宁... II. 金... III. 商业-帮会-宁波市-词典
IV. F727.55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358 号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沈师白

宁波帮大辞典

金普森 孙善根 主编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34.75 插页:8 字数:890 千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02-389-5/F·29 定价:120.00 元

凡 例

1. 坚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的编纂原则,力求客观地反映宁波帮的历史风貌和现状,释文务求准确,详略得当,文字简练流畅,以记述为主。条目字数一般在200~500字之间,但本着保存史料的宗旨,一些条目即使字数不多,材料不够完整,也酌情予以收录。

2. 本辞典收录以旧宁波府属镇海、定海(现属舟山市)、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南田和现属宁波市的余姚、宁海籍人士为限。

3. 本辞典内容主要收录在宁波商帮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与影响力的人物、组织、实业、公益、事件、文献等,收词时限自明末起,下限内地部分至1949年,台港澳及海外部分至1999年。收词范围:

人物类:旅外重要宁波商人、同乡组织或工商团体领导人、重大公益事业赞助人、重要历史事件参与者等。

组织类:同乡组织、与宁波商人有重要关系的行业团体和其他组织。

实业类:旅外宁波商人所创办或投资的重要工商企业。鉴于资料缺乏与可变性较大,他们在台港澳及海外所办企业本辞典暂未收录。

公益类:旅外宁波商人兴办、赞助的重要公益事业。由于资料上的原因,他们在台港澳及海外举办的公益事业多未收入。邵逸夫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至今他在内地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捐赠项目,限于篇幅,本辞典除其在家乡宁波外,其他捐赠项目均未列入。

事件类:与旅外宁波商人关系密切并在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历史事件,时限以1949年为止。

文献类:收录有关同乡组织章程、同乡刊物、行会规程,反映宁波商人重要活动或事迹的碑刻及其他重要原始文献。此类内容除有些在辞典中列出条目外,凡重要者都在书后收入原文,以供读者参考。

其他类:凡难以归入上述六类的其他有关词条。

考虑到事件类、文献类条目较少,出于编排的需要,本书分类索引分为五类:人物、组织、实业、公益、其他(包括事件、文献、称号等其他难以归入上述内容的有关词条)。

4. 本辞典所引用各种数据、资料以1999年为限。

5. 词条释文中凡专有名词首次出现均使用其全称,本条续见可用简称。某词条如有多种含义,其释文以①②③……分项陈述。

6. 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夏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表示,括注公元纪年,括注中省去“年”字,如“道光六年(1826)”。

7. 书末附有《海外及港澳台非工商界宁波籍人士选录》、《附表》、《文献》、《宁波闲话》等。

前 言

《宁波帮大辞典》是一部全面反映近 300 年来旅外宁波籍工商人士历史与现状的专门辞典。旨在千年之交全面回顾与总结宁波帮的发展历程,展示这一百年商帮的整体风貌和灿烂的宁波商业文化,增强人们对宁波帮的了解,整理保存有关重要史料,以弘扬宁波帮的创业精神,增强海内外宁波人的凝聚力,推动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凡熟悉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的人,均知道自 19 世纪中叶后宁波商人在中国工商界声名鹊起,地位日隆。尤其像对外贸易、金融保险、轮船航运及许多其他新兴行业,更成为宁波商人纵横驰骋的舞台。民国以后,藉着时势的推动与宁波商人的努力,他们在工商界的影响愈来愈大,以致有所谓“江浙财团的灵魂”的说法。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旅外宁波帮人士又积极参与和支持祖国统一与现代化建设大业而享誉海内外。基于此种情形,对宁波商人的研究便显得异常重要。特别是在今天,正值中国由传统社会渐渐转型至工商社会之际,了解宁波商人成功的经验,对于后人应有很多的借鉴意义。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史料的整理,编辑一部有关宁波商人历史与现状的工具书,便有其相当的价值。

宁波商人的研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即已有人着手进行。日本学者根岸佶曾撰《上海四明公所》一文,就上海四明公所的沿革、组织与目的作了一些初步介绍。后来,徐蔚南根据该文翻译整理成文,发表在《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①此后,国内外学术界一些学者对近世宁波商人这特定的商业群体抱有浓厚兴趣。根岸佶在其大作《上海のキルド》中辟专章介绍。^②而曼素恩(Susan Mann Jone)亦曾以其对清末宁波商人的研究而享誉学界,她主要考察的对象是宁波的钱庄业及旅沪甬商的金融势力。^③最近则有顾德曼(Bryna Goodman)在其《故乡、城市与国家:上海的地区网络与认同》(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 - 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一书中就上海的宁波商人同乡组织有较多的提及。帆刈浩之亦曾探讨过上海四明公所的“运棺网”的形成(《上海研究论丛》第 9 辑,1993 年 8 月)。国内学者虞和平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例,考察了“同乡组织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以上的研究多把视野局限在上海一地,并且以宁波商人在清末时期的活动为中心,因此使人难以得窥见这一问题的全貌。另外沈雨梧侧重于旅外甬籍商人个人事业之记述(如《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三联书店 1990 年 12 月),林树建对“宁波商帮”曾有通论性介绍。^④

以上学者在提到宁波商人时,多以“宁波帮”三字来概括。“宁波帮”几乎成了宁波商人的代名词。此种称呼自何时何人开始,现在已难以追溯。但至少在本世纪初,即有人使用此种名词。到清末民初,“宁波帮”一词,已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刊及书籍中。然而,名词的广泛使用并不意味着名

① 上海通志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 年,第 289-304 页。

② 根岸佶:《上海のキ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 年,第 31-67 页。

③ 如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if.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④ 《宁波商帮》,载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 1993 年 10 月。

词有严格的定义。究竟“宁波帮”这个词是指何种特定的群体,使用者并不一致。^①

按天津浙江会馆理事长张章翔的说法:“宁波帮是以乡谊为基础,在业务上、生活上互相需要,互相结合,互相利用的一个具有封建地域性的商业结合体。因人兴衰更替,具有实际活动而无具体组织,因之各地对宁波商人称之为‘宁波帮’。这就是称号的由来。”这里所谓“封建地域性的商业结合体”是什么意思,作者并未作解释。但表明“宁波帮”三字多是对外人对宁波商人的一种通俗的称呼,并不一定为宁波商人自己所接受。^②可以说,在多数情况下,“帮”更强调某种行业,如董少臣表示“天津五金行业中的‘帮’,并非封建派系,主要是同乡同业,外人习惯上称之为‘帮’,同一个帮的商家,彼此关系自然要密切一些。”^③如汉口四明公所选举通告中,便有请“同乡出捐各业各就本帮公推一至四人候选人”之语。^④一般在商人自己的称呼中,跨行业时似乎“帮”指代行业,如汉口的“八大帮”;^⑤而当在某一行业内部时,则用以区分地域,如重庆的药材业“十三帮”。^⑥

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学者对“宁波帮”曾提出一种定义:“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定海县六县在外地经商形成的商人集团。”此一说法与徐蔚南在《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一文中所称无异。^⑦但该一定义中所称“商人集团”,如果仅把其使用范围限定于在某埠经营特定行业的宁波籍商人,或者在某埠经营之甬籍商人之合称,并不限定与某行业并称,亦即“商帮”的原意,未尝不可,其英译或可为“Ningbo Group”。但如果扩大而为全国范围内甚或全球范围内的宁波籍商人甚或宁波人,且时间上未有规定,则概念的使用在学术上并不成立,虽然一般民间仍可套用此种称呼。

不过,出于多数人在习惯上以“宁波帮”称呼宁波籍工商人士的考虑,本辞典仍定名为“宁波帮大辞典”。但此种名称并不意味着编者同意某些对“宁波帮”泛化的理解。以本辞典编者的理解,“宁波帮”在此系指在近代以来在宁波地区以外的一定区域从事工商活动的宁波籍人士。而所谓宁波籍,既包括旧宁波府七县(镇海、定海、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南田),亦包括现属宁波市的余姚、宁海籍人士。

本辞典所收条目,主要分内地、海外及港澳台两部分。内地主要收近代(明清~1949年),而海外及港澳台则主要收1949年以后各相关者。之所以如此划分,盖缘于“宁波帮”一词的实际所指即有此两层意义。一般鲜有将1949年后在内地经商的宁波籍人士称为“宁波帮”者,而1949年前在海外及港澳台经商的宁波籍人士相对亦较少。辞典内容上则主要包括人物、组织、实业、公益、事件、文献等六个部分。

人物类主要包括旅外甬籍工商业主、同乡组织或社团的领袖、重大公益事业的赞助人、重要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等等。近世以来,宁波旅外经商者数以万计,即使以其事业而论,著名者亦不计其数。逐一记述资料上既无可能,而篇幅上亦无法容纳。于是,本辞典编委会遂定有若干条具体

① “宁波帮”一词据笔者考证至少有7种含义:同乡同业商人、旅居某地同乡商人总称、某地包括绍兴和南京等地在内的商人(所谓“大宁波帮”)、某埠甬籍人士总称、某行业同乡劳工组合、甬人帮会组织、海外宁波籍人士等等。请参见冯筱才:《乡亲、利润与网络:宁波商人与他们的同乡组织,1911-1949》,“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论文,2000年7月5-9日。

② 张章翔:《在天津的“宁波帮”》,《天津文史资料》,第2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67页。

③ 董少臣:《天津市五金行业的历史回顾》,《天津文史资料》,第32期,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39页。

④ 汉档,168-1-86-223。

⑤ 《关于国药近百年史料》,未刊稿,武汉市档案馆藏,第13页。

⑥ 朱君南、朱巨川、刘益洲、彭鑫滨:《四川药材业在重庆经营史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2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⑦ 徐说:“宁波帮这句话,包括颇广,是指前宁波府所管辖的鄞县、镇海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定海县、石浦县这七县的商民的”。徐蔚南:《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290页。

操作标准,比如何种资格的人物能够入选,而何种人物又只得除外。但无疑,资料的因素亦极重要,有的人物,我们明知道必须收入辞典,但无奈其资料却遍求不得,亦只有待诸异日发现资料后予以增补。需要指出的是,本辞典既重在收录工商界人士,所以凡主要职业非在工商界的人物,一般不予收入,如政界人士、教育科技界人士、演艺界人士等等。为了对当代台港澳及海外宁波籍人士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本辞典设附录收录活跃在大陆以外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宁波籍著名人士。

组织类主要包括同乡组织、与甬籍工商人士有重要关系的行业团体与其他组织等等。据目前所知,甬人创立会馆、公所似以创于明季的北京鄞县会馆为最早。到清末,甬人的会馆、公所在各重要商埠均有成立。而至民国初年,不少会馆、公所由于世事变迁已衰败湮没,但同时各地亦有新的会馆、公所被构建。据笔者初步统计,民初甬属的会馆、公所至少有23所。宁波人除了单独兴建以宁波、四明为名的会馆公所外,亦与他府人士合作建馆,据笔者统计,在民初,以“宁绍”命名的公所至少有5处。如果某地的宁波人并不是很多,或者其他原因,更多的则是命名为“浙江会馆”。此类会馆据统计至少有18处之多,遍布华北及西南地区。在青岛、济南等地,宁波人则是与福建人合建浙闽会馆。在海外,除直接冠以宁波同乡会外,宁波还常与江苏、江西等省籍人士组成三江公所,有的甚至范围扩大到所有非广东、福建籍人士,如20世纪初成立的新加坡三江会馆。民国后,同乡组织的一个变化便是同乡会的大量涌现。其中由宁波人所创办的同乡会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可能是其他地区人士无法比拟的。目前仅已知者即有60余家。其中不乏实力强大者,如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旅京同乡会、宁波旅杭同乡会、宁波旅汉同乡会、浙江旅津同乡会以及稍后成立的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宁波旅港同乡会、香港甬港联谊会等等。这些同乡会举办公益事业、给予同乡种种帮助。所有上面这些会馆、公所及其同乡会,凡目前能查到资料者均有收入。而仅知道名称而无具体资料找到者则亦俟至他日予以补充。

除同乡团体以外,其他行业性和社会性团体如天津洋服业同业公会、苏州坤震公所、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等等由于与宁波商人关系密切,故亦酌情收录。

实业类则包括旅外甬籍人士所创办或投资的工商企业,包括银行、钱庄、商店、工厂、公司及其各种形式的资本组合。原则上,近代部分所收入甬人企业主要为规模较大,资本亦较雄厚,并且有较大的影响者。如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刘鸿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厂等等。而由宁波商人集资兴建者由于具有典型意义,故凡能找到资料者均收入。由宁波商人与其他地区人士所合资兴建的企业,当符合选择标准时,亦酌情收入。但由于资料调查的困难,在企业的所有权问题上,可能会发生差错。或者本属于宁波人所开设者,由于资料上未能注明而误认作他地人所办;或者虽由宁波人担任经理但可能产权又不属于宁波人者,也许都会发生。目前只能依靠现有的资料,而作类似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对该企业产权的最后认定。

公益类系指旅外甬籍人士在宁波或外地兴办、赞助的公益事业,如教育、交通、水利、医疗、赈灾等等各方面。在宁波兴办者,由于资料易于搜集,所以一般遗漏不会很多,且多能记述较详。但在宁波以外所兴办者,则基本上以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为限。一些由宁波工商人士所创办的学校或他们的善举,现在由于年代久远,已不可考。或者虽知点滴信息,但无法撰成词条者,均只得放弃。这并不意味着本辞典的编者不认为历史上曾有过此种善举。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波籍人士在宁波本地及其他内地各省的捐赠,其数量非常巨大。是故,编者亦订有若干条选择标准,以利作业。

事件类则涵盖与宁波帮人士关系密切的、在当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历史事件。比如有名的上海四明公所事件、江亚轮事件等等。其选择者,或者主要由宁波工商界人士发动,或者主要参加者

为宁波工商人士,或者与他们有着极密切之关系。不过,可以想见,许多历史上的事件现今已湮没,资料亦无从可查。或者虽知道从大量的报纸入手,可能会找出一些蛛丝,但时间的仓促使得计划无法及时完成。是故,事件类条目在本辞典中所占份量很少。希望日后能予以不断增补。

文献类条目收录有关同乡组织章程、同乡组织主办刊物、行会规程及其他重要原始文献。此类条目由于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凡可查到者均予以收入。但此种文字材料,却最不易得。除在辞典中列出条目外,凡重要者,我们亦在书后予以适当收录文献原文,以供读者参考。

该辞典之编纂最早发起于1996年5月的“虞洽卿研究学术讨论会”。是会为近年来宁波商人研究中的一件盛事,亦使宁波商人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在会议进行中,本书的几位主编与宁波出版社的编辑开始酝酿“宁波帮大辞典”的编纂。此后,该项计划得到宁波出版社与宁波大学、宁波市侨务办公室、宁波海外联谊会、宁波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及慈溪市龙山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1997年《宁波帮大辞典》编辑委员会成立,1998年相关撰稿人均已聘定,并先后在杭州、宁波等地召开了数次会议。整个编纂工作历经四度寒暑,今日始初克其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关于宁波商人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所以在编写本辞典期间,参加者均感觉可有效利用资料的奇缺。为了能获得一些资料线索,我们曾专程作了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北上京津,南下闽粤,西至川鄂,“宁波帮”活动的重心所在——江浙地区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更留下了我们多次奔波的足迹与汗水。港澳台及海外部分我们在宁波市侨办、宁波海外联谊会大力协助下,多方联系,并得到了许多旅外宁波籍人士及团体的大力支持。虽如是,所获资料仍很有限。资料的限制可能会影响到辞典的完整性与全面性。另外,撰稿人个人所掌握材料或许有种种的偏狭,以致在条目撰写时出现错漏,亦盼识者一一指出。一切惟有在辞典再版时予以重新纠正。

百年商帮

——宁波帮的形成与发展

宁波人历来以商著称于世,以商为业,以商致富,代有其人,而作为一个商人群体,宁波帮则形成于明清时期,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帮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才能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在中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社会迈进的漫长历程中,宁波帮无疑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20世纪以来,世纪伟人孙中山、邓小平都曾对宁波帮寄予厚望。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16年在视察宁波时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①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在1984年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并为动员宁波帮人士参与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沧海桑田,百年辉煌。下面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一下这一百年商帮的不凡历程,以便对宁波帮有一个比较系统和整体的了解。

一、初始形成时期

(一)宁波地处东海之滨 自古海外贸易兴盛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唐宋以来,宁波一直是我国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宁波秦时称鄞(鄞县旧地在今宁波市南郊),早在秦代以前,已有近海岛屿上的渔贩盐商和滨海地区商贩来这里集货贸易。两晋南北朝时期,商贾已北抵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期,宁波市舶商船遥达海外。日本学者桑原鹭藏经考证后,认为明州(即今宁波)、福州、温州、松江等地,都是唐代中国的贸易港。^②当时,泛海兴贩去日本的中国商人,南路照例从明州出发,即使从福州、台州等地启航的海船,一般也先到明州停泊,然后再从明州,横渡东海,到达值嘉岛,再驶进博多津。大海商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都曾自备船舶,往返于日本与明州之间。当时明州不仅有大批日本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新罗(今朝鲜)和阿拉伯商人。北宋时期,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移置明州定海。那时明州是通往南亚、中东、非洲东海岸“陶瓷之路”的启航地,开赴日本、高丽(今朝鲜)的商船也大多在这里出发。“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③,明州舶务盛况空前。南宋时期,明州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徐兆昺在《四明谈助》中说,当时明州开明坊前后的大市、中市和后市,百货凑集,四方商船泊满划船场。元代,庆元(今宁

^① 《孙中山先生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之演说词》,《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

^② [日]桑原鹭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第4页。

^③ 《乾道四明志》卷一

波)古江夏码头改称下番滩码头,出洋土货进口番货都在这里集散。定海(即今镇海)也“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①。那时候,中日两国的贸易港,中国为庆元,日本为博多津,几乎两国所有的商船都来往于这两座港口之间。此外,庆元与高丽、真腊(今柬埔寨)、印度等国也保持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

(二)明朝政府厉行海禁 甬商资本转向内地

明朝政府对沿海各地厉行海禁,洪武年间曾三令五申,“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宁波合法的海外贸易渠道壅滞,而走私贸易异常活跃。这是明代宁波一带豪门巨室致力于手工业和商业经营,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商业资本力图冲破“海禁”束缚的必然结果。这种走私贸易,有的是外国商人联合中国走私商人和豪门巨室经营的,有的是被称作“海寇”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经营的。当时,宁波府所属的双屿港、烈港、岑港等地是私商云集的私人海上贸易港口。聚集在这里的私商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比比皆是。每年夏季,大海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葡萄牙人宾托在他的游记中说,当时双屿港每年进出口贸易额达300多万葡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②宁波一带商民视双屿“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纷纷到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双桅三桅,连樯往来”。他们以绵布、绸缎、湖丝,换取葡萄牙人的胡椒、银锭,并驾船在日本、宁波之间穿梭航驶,为葡萄牙人贩运商品,“往则载货扬帆以市海为名,归则熔金附身贸原舟而返”。^③

明嘉靖年间,宁波通番者已不可数计。这些私人海上贸易活动不仅规模大,活动范围也很广,“虽极远番国,皆能通之”。^④以王直为首领的海商集团,船多势众,鄞县海商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曾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头目。他们分领船队,经常满载硝磺、丝、棉等违禁物品,到日本、暹罗、西洋诸国贸易。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说:明代日本对华贸易,在特许贸易之外,商人们私下贸易也很盛行,主要途径是在宁波以中国人为掮客进行交易。^⑤

(三)敦重乡谊结帮经商 宁波商帮开始崛起

明代以前,宁波商人主要从事海外贸易,但在国内各地经商的也不在少数。据《甬上张氏宗谱》记载,宋代宁波巨商张云衢,在扬州经商发家,成为首富,人称“封君”。元代的倪涖也是一个能左右米市价格的大商人。特别是明朝厉行海禁,在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驱使下,宁波商人为了寻求商业资本的出路,除了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外,大批转向内地贸易。这时在内地经商的宁波人渐多,如万历年间,宁波人孙春阳在苏州开设孙春阳南货铺。据《履园丛话》记述,孙春阳开设的这家南货铺“天下闻名”,所制物品有上贡宫廷御用的。这店规模恢宏,店房分为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蜡烛等六房,“店规之严,选料之精,合郡无有”。^⑥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宁波绍兴一带“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⑦《广志绎》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可见明万历前宁波人外出经商已为数不少,明末宁波商帮的崛起并非偶然。

如前所述,宁波人外出经商古已有之,而结成商帮则是明代末年的事。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这可以看作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标志。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

① 《至正四明续志》卷三

② 张天铎:《中葡通商研究》第77页。

③ 王在晋:《海防纂要》卷五。

④ 万表:《玩鹿亭手稿》卷五。

⑤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1页。

⑥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⑦ 王士性:《广志绎》卷之四,江南诸省。

四明会馆,有旅京宁波同乡公益会于1924年所立的四明会馆碑记,碑文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①从四明会馆碑记的记述看,当时的鄞县会馆属于以商人为主的同乡会馆。稍晚于鄞县会馆的,还有坐落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会馆中有碑载:“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又名浙慈馆,约在清初成立,光绪十六年重修。”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立的财神庙成衣行碑,记述了创办浙慈会馆的缘起和经过。碑文说,当时北京的成衣行都是浙江慈溪商人,他们来京贸易,为全国各省徒弟授艺。因而,这座由各成衣铺掌柜、伙友出资兴建,专供成衣行祭祀财神用的会馆,取名浙慈馆。这是旅京宁波成衣行商人的主要活动场所。

二、迅速发展时期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前,中国沿海地区商品货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商业资本益形活跃。这时期宁波商帮得到了较快发展。

(一)埠际贸易迅速发展 甬商实力迅速壮大

这一时期,宁波商帮的海外贸易有所复苏。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时,议定宁波为对外通商海口,三十四年(1695)分别在宁波、定海设立浙海关,荷兰、英国等西欧商船趋定海,云集宁波。仅康熙四十九年(1710)一年之内,来定海的英国商船就达10艘。同时,宁波大批海商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七年(1688)日本限定进口的70艘清朝船舶中,有宁波及普陀山船13艘。宁波商船还驶往南洋群岛等地经商。道光十年(1830),上海、宁波驶往暹罗、安南、菲律宾等地通商的远洋帆船有45艘,^②加上驶往其他地区的船只,估计有七、八十艘至一百艘海船。每艘以三、四千石至五、六千石,即二百余吨至三、四百吨计,载货量约二万吨至三万吨。

特别是宁波商人经营的沿海埠际贩运贸易,这时有了长足的发展。道光初年,每年由山东、辽宁来宁波的海船约600多艘,从福建、台湾来的约500多艘,从广东来的约20余艘,加上上海及本省各埠来的船只,每年来往海船约有1000多艘。此外,还有从内河来的内地河船近4000艘,合计每年货运量约有20余万吨。^③与此同时,宁波商人还自造沙船和宁船等大型海船,从事埠际贩运贸易。嘉庆九年(1804)仅在镇海、上海等地驻港的宁船就有400艘。这些宁船一般北上天津、营口等埠,一年往返三次。当时营口沙船坐港者常有七、八百号,宁船也有数百号,每年进港的沙船和宁船在8000艘以上。这些沙船和宁船不少是来自宁波的。至于天津更是“商船往来,樯帆相望,几于蔽日”^④。北上从事埠际贸易的海船,宁波人叫北头船,经营北头船货运业的叫北号。他们一般把关东、直隶等地产的豆、麦、杂粮及其他北方特产,装运到上海、宁波贩卖,并把福建、广东等地贩运来的糖货、木材、海产品和外国进口货物,运往天津、营口等地。

经营沙船贩运业需要巨额资本,船中装载的货物都由船主自行筹款营办,自行销售。一般由宁波、上海运往北方的货值达十三、四万两银子,由北方载回的货值达五、六万规元。鄞县秦氏、吴氏,慈溪三七市董氏、二六市孙氏、三漕童童氏、半浦郑氏,镇海小港李氏、乐氏都是北号大股东。

①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7—98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90页。

③ 马丁:《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307—308、135页。

④ (乾隆)《天津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

《宁波府志》说：“溯关东以达闽粤，帆樯来往，一岁不下千艘，利擅海王。”^①

埠际贩运贸易兴盛，是宁波商帮得以迅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沙船贩运业是冒险的行业，也是发财的捷径，如果平安无事，来回南北洋几趟，就可获取巨利，不少宁波巨商就是沙船业起家的。同时沙船贩运业还加强了宁波商帮与沿海港口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的经济联系，大大增强了他们在这些地方的势力。

（二）各地会馆相继创立 同乡扶助声势日隆

这一时期，宁波商帮不仅在北京、天津、营口的势力有所加强，并把势力迅速扩展到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重镇，在那里创建会馆，以会馆为联络场所，结帮经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宁绍商人在常熟创设宁绍会馆。《常熟宁绍会馆始末记》中说，宁波、绍兴一带人素以善贾著闻海内，经商足迹遍及通都大邑。常熟号称江苏富饶地区，商业繁盛。宁波、绍兴两郡商人在这里经营、留居，为时既久，人数亦多。有识之士深以没有一个团结同乡的组织为憾，因而在乾隆三十六年以宁波商人叶林春为首集资置地建义廨所，创立宁绍会馆。^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号称“八达通衢，九江巨镇”的汉口建立浙宁公所。《夏口县志》载，宁波会馆在九如桥，清乾隆庚子年创设，用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旧名浙宁公所，清宣统元年改宁波会馆。^③

上海与宁波一苇可航，是早期宁波商人的重要活动地域。康熙年间，已有不少经营沙船业的宁波商人到上海谋生。嘉庆以后，宁波商帮中的几个著名家族集团相继到上海发展。据《镇海柏墅方氏宗谱》记载，镇海方氏家族嘉庆年间便在上海发迹。嘉庆初年，方亨宁只身赴沪，开设店铺。不久，其在镇海憩桥开粮食行和杂货店的弟弟方亨簧(字介堂)也辗转来到上海，开设方义和糖行，经营食糖。介堂的族弟方建康，随介堂到上海。后在介堂资助下，自设方泰和糖行，兼营南北货，生意甚为兴隆。介堂去世后，他的族侄方润斋和方梦香又在上海开设方萃和糖行和振承裕丝号。道光十年(1830)，介堂的儿子方仁熙在上海南市设立履和钱庄，兼营土布和杂货。

镇海李氏家族集团的第一代人物李也亭，也是这个时候到上海经营沙船贩运业的。李也亭于道光二年(1822)初到上海时，在南市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当学徒。当时，上海沙船业已很兴盛，南码头是沙船的停泊地，李也亭每天送热酒上船，与船工混得很熟。船上老大(专管航行)和耆民(专管货物买卖，类似经理)见他勤快机敏，便劝他到沙船上做事。沙船工工资虽低，但允许附带货物。李也亭到沙船做工后，开始随船附带少量货物，往返几趟，渐有积蓄，便投资于沙船业。后来积资日多，就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号，拥有沙船10余艘，往来南北洋。不久，他又买进黄浦江边的一个码头，取名久大码头，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上海沙船业的巨擘。

乾嘉年间，宁波商人在上海开设钱庄的也不断增多。嘉庆十四年(1809)，在上海邑庙东园创设上海钱业总公所，业中人称内园。加入钱业总公所的钱庄，称入园钱庄。当时上海入园钱庄有64家，多半是宁绍帮的汇划钱庄，资力雄厚。宁波商帮利用钱业总公所，操纵着上海的钱业市场。

这时，宁波商帮在上海不仅人多势众，同乡扶助的观念也日益强烈。嘉庆二年(1797)，在黄元圭、潘凤占、王秉刚的倡议下，捐资置地，在上海二十五保四图创设四明公所。^④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关外、山东等地贸易的一批宁波商人又集资在上海创建浙宁会馆。《上海县续志》载：“浙

① 《宁波府志》重刻宁波府志序。

②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0—371页。

③ 《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

④ ④ 《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会馆公所。

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甬商董萃记等创建。”^④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大概是经营沙船贩运业的宁波北号商创建的。

这个时期宁波商帮所建的会馆、公所,性质和作用有所变化,经济功能有所加强,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议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⑤这是宁波商帮实力迅速发展和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标志。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年),是宁波商帮迅速发展时期。这时宁波商帮的势力已扩展到各沿海港口城市和长江沿岸重镇;经营的行业,除了传统的药材业、成衣业和粮糖业外,沙船贩运业和钱庄业异军突起,实力雄厚,在各地商界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商帮内部的凝聚力也大大增强。

三、臻于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尽管在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业重镇有相当势力,毕竟未能突破旧式商帮的格局。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人脱颖而出,他们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活动地域,更新经营项目,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的优势,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这个时期,是宁波商帮臻于鼎盛的时期。

(一)活动地域不断拓展 通都大邑势力尤雄

近代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他们活动地域已不限于北京以及沿海港口和长江中下游少数几个城市,而扩展到全国各地,包括僻远的乡村和山城,甚至远达海外。《鄞县通志》说:邑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定海县志》也说,“国内北至蒙古,南至粤桂,西至巴蜀;国外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几无不有邑商足迹。”

这时,宁波商帮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沙市、苏州、杭州等地的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少宁波商人成为当地商业巨子,在商界位据要津;有些地方的几个行业为宁波商帮所垄断;有些地方的商业团体为宁波商帮所操纵。

1. 宁波商帮在北京 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多半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经营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都是清一色的浙东商人”。^⑥ 闻名京城的同仁堂药铺,是原籍宁波府慈水镇的乐氏于康熙年间(1702)创办的,这时又有新的发展。乐家第十代孙乐平泉重振祖业,扩建同仁堂,乐平泉的孙子乐达仁还另设达仁堂。宁波的银号商人在北京建有银号会馆。宁波帮巨商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票号和王铭槐开设的胜豫银号,都在北京设立分号。宁波成衣商人的势力也不断壮大,光绪十六年(1890),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 73 人发起重修浙慈会馆,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

2. 宁波商帮在上海 “沪地为宁商臻集之区”^⑦,正式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崛起使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商品流通网络。宁波毗邻上

^⑤ (民国)《鄞县通志》第二,政教志丑编,党部团体。

^⑥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 18 页。

^⑦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2 页。

海,交通便捷。到清末,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

宁波商帮是“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①长期以来宁波商人在上海按行业分帮,分别建立各业各帮会馆。如余姚陈淦,慈溪罗秉衡、袁鏊,鄞县李汉绶等创建上海市钱业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宁波肉业帮在沪创立诚仁堂;光绪十八年(1892),宁波府属六县马车漆业帮在沪创立同议胜会。重修上海轩辕殿时,助捐各户中有宁波府属六县的洋广帮、洋行帮、零剪业、兜套业和衣庄店伙。此外,还有水产业的同善会、海味业的崇德会、酱酒业的同义会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明公所在上海日晖港购地30多亩,广构屋宇,扩充办事厅室。这些各业各帮的会馆,都总汇于公所。^②宣统元年(1909),慈溪人洪宝斋与宁波同乡数十人商议,在汉口路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次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会员多数是商界人士,对团结同乡,协调商务,共同对外商业竞争,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1909年宁绍帮商人虞洽卿、朱葆三等集资创办宁绍商轮公司,以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相抗衡。当时,票价竞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涨价。这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船。太古轮自恃资本雄厚,联合东方轮,把票价从一元降到三角,以图压垮宁绍轮,还以赠送毛巾、肥皂招揽乘客。在宁绍轮亏损日甚、濒临困境的情况下,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动全体宁波同乡集资,组织“宁绍公司航业维持会”,补贴宁绍公司亏损,并相约不乘载外轮,最后迫使英商同意统一沪甬线航轮票价。

在近代中国,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是由宁波商人组成和主持的。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慈溪人)便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划组建商会。严信厚奔走呼号,联络上海各业商人,并亲自捐资赁庑,制订章程,创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札委严信厚为总理,周晋镛(慈溪人)为提调。这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市商务总会,严信厚任总董。光绪三十一年(1905),定海人朱葆三任该会协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镇海人李书云任第三任总理。辛亥革命后,1912年6月该会改名为上海总商会,第一任总理是周金箴(即周晋镛)。1914年6月任期满后,他又连任总理,并选朱佩珍(即朱葆三)为协理。1915年周金箴调任海道尹,众人推举朱葆三任总理,直至1920年6月。1920年,慈溪籍钱业商人秦润卿任副会长。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镇海人虞洽卿任会长。1926年,镇海人傅筱庵得到军阀孙传芳的支持,被举为会长,虞洽卿另外组织上海商界联合会。此后,宁波商人一直在上海商界居重要地位。一些宁波帮巨商成为上海滩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曾流行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上海惟一两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也都是宁波商人。

3. 宁波商帮在汉口 近代汉口五方杂处,商贾辐辏,宁波人在汉口经商的也为数不少。1918年汉口总商会所列的各帮会员名册中,有宁波成衣帮、典当帮、老银楼帮、新银楼帮、杂粮帮、药材帮。作为汉口宁波商帮重要活动场所的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重加修葺,改名宁波会馆。

宁波商帮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货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业、洋油业、五金业和银行业,并有不少宁波商人充任洋行买办。《夏口县志》载,汉口的水产海味业和银楼首饰业,大半为宁波帮所垄断。汉口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附属的太古车糖公司,每年在汉口销售的车糖约有10万

^① 吴拯寰:《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上海地方史资料》(三)。

^② 《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会馆公所。

吨,资本雄厚的宁波帮海味商号,往往兼营糖业,是他们主要的销售对象。长江的夹板船航运业也都由宁波商人经营。这些夹板船运往汉口贩卖的主要是棉纱、棉布、绸缎、海产品,从汉口运出的主要是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苧麻、棉、米,1918年贸易额约3560~4000万两。杂粮业中,有一个汉帮志成堂的组织。这种“汉帮”并非汉口籍商人组成的帮口,而是专做汉口及长江上游来货生意的商人的一种行会组织。主持者多为宁波商人,如元丰号、永昌元号、恒兴仁号、成太义号,他们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还组织杂粮茶会。

汉口商界的头面人物有不少是宁波商人。镇海人宋炜臣(即宋渭润)光绪二十三年(1897)到汉口,与镇海巨商叶澄衷合资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该厂资本30万两,“制造甚属可观”。光绪三十二年(1906),宋炜臣又着手创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集股300万元,筹建电灯和自来水工程。3年后,电灯工程竣工启用,旋即自来水工程也告成。此举大大改善了汉口居民的照明和饮水条件,身为这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宋炜臣,由此而一跃成为“汉口头号商人”,并被选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在历届汉口商务总会的议董中,宁波商人占有不少席位。首届总理是鄞县人卢鸿沧(中国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第二届协理是镇海人汪炳生(汉口太记洋油行行东);第九届副会长是镇海人郑似松(汉口太和杂粮行经理);鄞县人蔡永基(汉口华昌洋行经理)、蔡瑞卿,镇海人盛竹书(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史晋生(汉口顺记洋油号经理)、沈宾笙(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王柏年(汉口美最时洋行经理),慈溪人秦楔卿、赵典之、郑燮卿,都曾任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或会董,不少人连任数届。

4. 宁波商帮在天津 近代天津是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集散地。宁波商人经营的大型帆船(俗称北头船)往返行驶于宁波、上海、天津各埠,除为清廷漕运粮食外,还兼营南北货运生意。天津漕运局总办张友堂是宁波人,曾给同乡很多方便。北头船在天津闸口建有商船公所,他们到达天津后,往往在这里聚会。宁波帮和广东帮是天津商界两个势力最大的帮口,天津未开埠前,宁波商人就不断从海路来津,在北大关一带经营南北土产、洋广杂货。1860年天津根据《北京条约》开埠后,宁波商人更蜂拥而至,投靠原来在北大关一带经商的亲友、同乡,使宁波商帮的势力迅速壮大,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法租界。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是最早进入天津法租界设店经营的中国人。早期设在法租界的宁波帮名店有冠生园南味店、李同益西服店(另一说是李同益呢绒店)等。

这时,在天津的宁波商人已为数甚多,除贩运南北货物的北号庄客童承初外,宁波商帮头面人物如严筱舫(即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等,都活跃在天津商界。严信厚曾为李鸿章镇压捻军转运饷械。他办事干练,深得李的赏识。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曾保委严督销长芦盐务和河南官运事,光绪十一年(1885)署天津盐务帮办。任内,严筱舫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开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发了大财。之后,又在巨商胡光墉(即胡雪岩)和叶澄衷的支持下,在上海设立源丰润分店10多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汇兑网,经营国内总汇和商业拆放业务,兼营官僚存放款业务,盛极一时。与此同时,严信厚又在天津估衣街开设物华楼金店和老九章绸缎店天津分店(总店设在上海)。这两家店生意兴隆,10余年间,积资巨万。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号,光绪四年(1878)在天津英租界达文波路设立分号,除做五金生意外,还代理美孚公司煤油和英美烟公司纸烟。他还凭借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附设信裕公司,专做军火买卖;后又开设大庆元票号,经营汇兑及存放款业务。叶澄衷还在天津经营地产生意,获取厚利,成为天津商界颇有影响的巨商。镇海人严蕉铭光绪八年(1882)到天津经商,历任顺金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是天津商界颇具声望的买办。鄞县人王铭槐光绪四年(1878)到天津,初任老顺记五金号天津分号副理,后又任德泰

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商礼和洋行买办，并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他做军火生意获利数百万，并对宁波商帮在天津的商业活动多有助力。凡是宁波同乡到天津谋生的，他都热心为他们引荐：懂得外语的，竭力推荐到天津各大洋行充当买办；想经商的，则资助资金，使宁波商帮在天津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镇海人叶星海光绪十三年（1887）与德商吉伯利同到天津，创办兴隆洋行。光绪年间，严信厚、严蕉铭、王铭槐等，发起将北门里户部街浙江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这个会馆虽为浙江同乡会馆，而成员多数是宁波商人，会务领导权始终由宁波帮掌握，成为宁波商帮在天津联络同乡的重要场所。此后，天津的宁波商帮声势益壮，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他们经营的。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南北货运业、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中，宁波商帮都有相当大的势力。

5. 宁波商帮在沙市 湖北沙市在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是湖北省粮棉土产集散地和工业品的重要转口市场，人称“小汉口”。沙市的浙江帮势力很大，浙江帮又以宁波商人为主。

宁波商帮在沙市最大的生意是经营银楼业。他们开设的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凤、老万年等银楼，都是沙市的名店。他们财力雄厚，除经营金银首饰、兑换金银等业务外，有的还兼营他业。为洋行代销煤油，更为宁波商帮所垄断。美孚煤油公司的慎大、亚细亚煤油公司的甌记、德士古煤油公司的明德，这 3 家煤油代销店的经理全是宁波人。沙市及附近地区所销煤油，都由这 3 家批发，获利甚丰。慎大经理许惟山抗战前有现洋 10 多万元，他用这笔钱开设联太、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棉纱、匹头、杂粮，并做黄金生意。宁波商帮在沙市还经营海味业，德慎昌、同春和、天福等，都是沙市海味名店。沙市一度盛行宁波家具，宁波商帮中不少人就地开设作坊，售卖宁波家具。这些家具制作精细，在沙市享有盛誉。清末民初，在沙市的宁波商人渐多，虞洽卿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有三北、鸿源、鸿亨、鸿利、鸿真 5 艘轮船定期航经沙市。1919 年还在沙市兴建三北码头。

6. 宁波商帮在苏州 近代苏州是一个商人辐辏、市肆喧阗的繁华城市，宁波商人当然不会放弃这块宝地。宁波的丝绸业商人曾在这里创立宁绍会馆，煤炭业商人也设有坤震公所。宁波商帮几乎独占了苏州的煤炭行，在阊门外煤炭公所里，有一碑文说，在苏州经营煤炭业的，都是宁波、绍兴籍商人。光绪年间，宁波商人曾在南濠大街 147 号创立浙宁会馆。

7. 宁波商帮在其他各地 宁波帮商人在本省杭州、台州、温州等地经商的人数也不少。如他们在杭州收购丝、茶，推销进口洋货，并大量开设钱庄，杭州钱业公会就是由宁波商人发起创立的。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开设的宁波帮钱庄有慎裕、豫和、康和、阜生、阜源、和庆、元大、惟康、介康、寅源、崇源、仑源、堃源、聚源、同源、益源等近 20 家。

这一时期，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已不限于大中城市和通商大埠，在市镇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如湖州南浔镇北下坝的宁绍会馆，创建于嘉庆年间，同治五年（1866）、光绪十六年（1890）先后两次重修扩建。

在市场拓展上，宁波商人往往把总店设在大城市，在全国各地广设分支机构，连偏僻的乡村和山城也有他们的经销网点。如宁波巨商周宗良开设的谦和靛油号，总号设在上海，在全国遍设推销机构。他把分支机构分为 3 级：第一级是设在各省大城市的分号，先后设立的有芜湖、济南、天津、营口、西安、汉口、长沙、贵阳、开封、苏州、蚌埠、南昌、宁波、南通、福州、重庆等处；第二级是由分号管辖的支号，每一分号下面大致有 3 至 6 个支号，如济南分号下有烟台、青岛、潍县 3 个支号，汉口分号下有老河口、洛阳、许昌、驻马店、郑州、宜昌 6 个支号；第三级是由支号管辖的经销店或代销店，如青岛支号下有德州、临沂、兖州等店，从而形成了广泛的销售网络。1927 年宁波有 64 家药

行,其中37家分别在川、鄂、陕、港、粤、京、津、赣、皖、滇、黔等药材产地设庄办货,药材商的足迹踏遍山川险滩。药业中人说,“当时要做十八省生意”。^①不少药行还与台北、汉城、大阪有业务往来。

宁波商帮经营的民信局,活动地域更广。这是由宁波商人首创,专为商民传递信件的行业,清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是它的鼎盛时期。宁波商人将民信局的总局设在上海,在全国各地遍设分局和代办处,星罗棋布,互相联络,宁波商帮的势力也由此渗透到全国各地。

(二)适时更新经营项目 擅长经营新兴行业

宁波商人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开拓经营项目。鸦片战争后,欧风东渐,社会风尚有了新变化。宁波商人预感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重点投资新兴行业,并且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挹注,使宁波商帮经营的许多行业在国内商界居于优势。

1. 保持特色的传统行业 宁波商帮许多老行业在国内商界久享盛誉,特别是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名闻遐迩。

(1)银楼业 银楼业前店后场,是制作和经销金银饰品、镶嵌珠玉宝石的“富贵生意”。鄞县、慈溪、镇海一带商人在各通都大邑开设银楼的很多。他们善于揣度社会风尚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制作和销售流行饰品。这些饰品成色足赤,款式新颖,精镶细嵌,玲珑剔透,牌子很响。

宁波商人经营的银楼业,以上海最盛。据《甬光》初集记载,他们在上海开设的银楼有35家之多。这些银楼都有一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把作师傅,对顾客定制的特殊珍饰更是一丝不苟。其中老凤祥、新风祥、杨庆和、裘天宝、方九霞等银楼,远近驰名,妇孺皆知。

据《夏口县志》记载,汉口的金银细工业,大半为宁波人所占。

天津的银楼名店大多也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严信厚出身于胡雪岩开设的杭州信源银楼,早年在上海宝成银楼任过职,后来又在天津开设物华楼金店。物华楼金店初设估衣街,1912年迁到北旭街,估衣街旧址改为分店。这是一家信誉卓著的名店。宁波商人在天津开设的银楼名店还有恒利金店、天宝金店、新宝华金店。恒利金店是北京“四大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之一恒利银号附设的金银首饰柜,初设估衣街,1912年迁到北旭街,股东多为慈溪商人。天宝金店由王品南、冯占祥、徐禄生、张润益合伙经营,初设北旭街,后迁到法租界四号路。新宝华金店由谢铁明、王耀生、詹文敏合伙经营,店址在罗斯福路。这些银楼一般收购同业熔炼的金银,进行加工提纯,再自制首饰。他们经销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镶嵌首饰,成色高,质量好,深得用户信赖,兼之他们经营灵活,重视门市销售业务,往往顾客盈门。

沙门有名的银楼,如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凤、新风祥、老万年等,也都是宁波商人开设的。这些银楼,购买金条,收购旧金银器皿熔炼制作成首饰出售,获利甚厚。老同震是沙市银楼业巨擘,周转金量常在400两上下,并在汉口、上海等大城市派驻店伙,随时通报金融信息。老天宝次之,周转金量约300两。老万年、老丹凤、老宝成、新风祥等银楼也各有100两左右的周转金量。老天宝银楼开设于1927年,是童家椿、童家昌兄弟俩合资创办的,所制作的金簪、镶玉簪、项链、扣花、高级钻戒等金质饰品,成色足赤;大小银盾,酒器、托盘等银质器皿,式样精美。这些金银饰品上面都打有老天宝的信誉标记,以防假冒,生意十分兴隆。

(2)药材业 药材业是宁波商帮早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宁波商人在北京最早设立的鄞县会馆,

^① 《宁波资本主义工商业简史》,《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